

首都师范大学历史系 建系四十周年纪念论文集

1954—1994

首都师范大学出版社

(京)新 208 号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首都师范大学历史系建系四十周年纪念论文集/首都师范大学历史系编著. —北京:
首都师范大学出版社, 1995

ISBN 7-81039-549-1

I. 首… II. 首… III. 史学—世界—纪念文集 IV. K-5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95)第 04536 号

首都师范大学出版社

(北京西三环北路 105 号

邮政编码: 100037)

北官厅印刷厂印刷

全国新华书店经销

1995 年 5 月第一版 288

1995 年 5 月第一次印刷

开本 787×1092 1/16

印张: 18.25

字数: 438000

印数: 500 本

定价: 28 元

目 录

序.....	齐世荣	(1)
关于历史发展的动力.....	宁 可	(2)
毛泽东的历史人才观.....	邹北辰	(11)
古代中国战争的地理枢纽.....	宋 杰	(19)
试谈山戎人的美感、原始宗教意识		
一兼论山戎与燕国及中原地区的文化交流.....	张秀荣	(29)
汉代地主在农业上使用佃农与奴婢经济效益的比较.....	杨生民	(34)
汉代儒学的社会政治效应.....	苏俊良	(39)
东晋南朝大土地所有制的发展.....	蒋福亚	(47)
东晋南北朝时期的佛教结社.....	郝春文	(53)
王著《魏晋南北朝史》考异.....	许福谦	(67)
隋开皇大业年间户口盛衰考实.....	陶文牛	(82)
论盛唐气象.....	阎守诚	(88)
试论唐朝的钱铜比价问题.....	孙文泐	(94)
唐后期“格敕”对官吏处罚条款的修改.....	侯 雯	(101)
略论辽金至明清时期京师文化的特点.....	李淑兰	(107)
杨守敬舆地著述考辨.....	郝志群	(114)
试论梁启超《异哉所谓国体问题者》一文的内涵与要害.....	刘振岚	(124)
论辛亥革命时期章太炎的民族主义.....	王 才	(134)
抗日战争中的华侨.....	王佩莲 周兴旺	(141)
宗教、民主政治、城邦精神与希腊悲剧中政治倾向的产生.....	张文刚	(150)
西方社会史名著：《失去的世界》.....	戚国淦	(158)
西欧中世纪家庭史研究综述.....	刘新成	(162)
论 16 世纪英国经济变革之研究.....	陈曦文	(170)
哥伦布的美洲“发现”与西欧资本主义的兴起.....	王乃耀	(176)
怀俄明家畜饲养协会的历史作用及其衰落原因.....	周 钢	(184)
略论 1875 年英国购买苏伊士运河股票.....	赵军秀	(194)
中国抗日战争与国际关系(1931—1941).....	齐世荣	(200)
英国与“九一八”事变.....	徐 蓝	(213)

1939 年中立法与美国国会政治	韩 莉	(224)
再谈“第二战场”	张大卫	(232)
战后欧洲国家集团化的进程及其分期	吴 伟	(243)
中学历史教学中史料教学的探讨	叶小兵	(250)
评日本高中学校新编历史教材的基本特征	赵亚夫	(259)
谈历史系对教育见习工作的改革	杨朝晖	(266)
浅谈高校行政管理的科学化	李剑华	(270)
浅谈高校人保秘书的职业素养	脱凤琴	(272)
清除腐败 加强廉政建设是共产党员的责任	于祥莲	(276)
试论当前大学生的思想困惑及其正确导向	于丽萍	(280)
附录:首都师范大学历史系简介		(286)
后 记		(288)

序

齐世荣

这本论文集是为了纪念首都师范大学历史系建系 40 周年而印行的,共收论文 37 篇,大体上反映了我系在历史理论、中国史、世界史、教材教法和党政工作几个方面的科研成果。

40 年来,我们艰苦奋斗,曲折前进,今天终于有了一支具有相当水平的老、中、青相结合的教师和干部队伍,不仅能够培养本科生,而且能够培养硕士生和博士生了。我在建校四十周年给学校的题词中说:“创业难,守成不易,发展更难。”我们今后要继续发展,以下几点经验似乎可供参考:

(一)要树立雄心壮志。大至一个国家,小至一个单位,一个人,都要有志。我系建立之初,只有 8 名教师,其中只有副教授 1 人。当时既不为社会所知,甚至也遭到本系若干学生的轻视。但那时的建系者不怕别人讥笑,坚信定能白手起家,把系办好。经过 40 年的艰苦奋斗,今天的首都师范大学历史系已经拥有 48 名教师和干部,其中教授 10 名(3 人为博士生导师)、副教授 23 名,在教学和科研两方面都取得了不少的成绩,受到社会 and 同行的重视。

(二)要团结合作。一个单位,特别是知识分子成群的单位,必须坚决克服文人相轻的毛病,搞好团结合作。团结的基础是大家都以事业为重。我系从一开始就在这方面打下了良好的基础,同志们都具有敬业精神,一心追求事业的成功,而不计较个人的恩怨。我们之所以能有今天的成就,团结合作是一个重要因素。

(三)要教学和科学研究并举。在高等学校,教学和科学研究是相辅相成的,缺一不可。“文革”前,系内少数同志轻视科学研究,甚至错误地把科学研究成绩突出的同志说成是走“白专道路”。经过拨乱反正,目前科学研究在我系蔚成风气,教学和科学研究相互促进的局面已经形成。

愿后继的同志们谦虚谨慎,努力把首都师范大学历史系办得越来越好。

1994 年 12 月 25 日

关于历史发展的动力

宁 可

历史发展动力的理论是历史唯物主义基本原理的一部分,它要回答的是:哪些力量推动着历史的发展,这些力量在历史的运动中各占什么样的地位,起着什么样的作用,怎样地起作用,它们之间的关系又是怎样的。历史发展动力的理论说明了历史发展客观规律如何具体地运动和朝着什么方向运动,它指导人们正确认识历史,也指导着人们正确地创造现在和预见未来。

千百年来,人们对历史动力问题并没有作出正确的回答,他们不是把历史的动力归之于天意或超乎于历史之外的“绝对精神”之类,就是归之于卓越人物的活动、个人的意志乃至偶然因素。马克思恩格斯第一次指出,在人们纷繁错杂、意愿各别、交互作用乃至互相冲突的无数历史活动中,“一切重要历史事件的终级原因和伟大动力是社会经济的发展、生产方式和交换方式的改变、由此产生的社会之划分为不同的阶级、以及这些阶级之间的斗争”,从而科学地回答了这个问题。

中国民主革命的胜利又一次证实了马克思主义关于历史发展动力理论的正确,也促使史学家们运用它来研究与说明中国历史包括阶级斗争的历史,并且取得了成绩。然而,建国以后阶级斗争的“左”的理论特别是“以阶级斗争为纲”的提出,导致了现实生活中阶级斗争的扩大化,也使得史学领域内的一些同志在其影响下,对历史发展的动力的认识偏离了马克思主义,脱离了历史的实际。这种倾向到文化大革命中,在“四人帮”的极“左”路线的影响下发展到了顶点。象在对中国古代历史的认识上,片面地强调农民战争是历史发展的唯一动力,不去注意各种历史因素的交互作用,或者仅仅简单地为它们贴上阶级的标签而不作具体分析,就是这样。

在“文革”后的拨乱反正过程中,人们重新认识这个问题。1979年开始的历史发展动力问题的讨论,批评了在“阶级斗争为纲”思想影响下的对历史动力问题的错误认识,强调了从经济方面来了解历史发展的根本动力,也注意到了历史发展的多样性与复杂性,以及各种因素的交互作用。各种意见纷陈并出,认识并不完全一致,这对于促进研究的深入是有积极意义的。而近几年来淡化乃至否定历史上的阶级斗争的作用以及经济的最终的决定作用的倾向也出现了,地理环境决定论,需要、利益或欲望决定论,文化决定论等等错误认识也开始流行起来。因此,继续讨论历史发展的动力问题是需要。

没有动力,就没有历史的发展。

“发展是对立面的斗争”^③，“事物发展的根本原因，在于事物内部的矛盾性”^④，社会发展是“在矛盾中实现和通过矛盾而实现的”^⑤，历史发展的动力，来自历史事物内部的矛盾性。

历史事物的矛盾性是多样的，多方面的、多层次的。历史发展的动力也是多样的、多方面、多层次的。物质资料的生产是人们全部历史活动的基础，“物质生活的生产方式制约着整个社会生活、政治生活、和精神生活的过程”^⑥。因此，在所有的矛盾中，物质生活中的生产关系与生产力之间的矛盾，全部社会生活中上层建筑与经济基础之间的矛盾，是社会的基本矛盾。生产关系要适合生产力的性质，上层建筑要适合经济基础的性质，就是社会基本矛盾的运动规律。在这两对矛盾中，制约着整个社会生活过程的生产关系与生产力的矛盾是更基本的。生产关系与生产力之间的矛盾是历史发展的根本动力。

在生产关系与生产力这对矛盾中，二者的地位和作用是不一样的。

生产力所反映的人和自然的矛盾是永恒的，连续的，不能中断的，先后相承的。人们不能自由选择生产力，任何生产力都是一种既得的力量，以往活动的产物，后一代人所得到的生产力都是前一代人已经取得并且被他们当作原料来为新的生产服务。不仅如此，人们为满足需要而进行的生产，这种已经得到满足的需要本身，满足需要的活动和已经获得的为满足需要的工具、技术和知识，以及人口的繁衍等等，又引起新的需要。这就使得已经达到的生产力水平不仅要继续，而且要发展。不仅要维持简单再生产，还要进行扩大再生产，不仅需要量的增长，而且要有质的提高，不仅需要已有的生产的积累，而且要开拓新的生产领域。在生产中获得的经验、工具、科学、技术、方法、组织管理形式以及生产者素质等总是要不断地添加到原来的基础上去，使得生产具有越来越大的规模和内涵、越来越高的水平和质量。生产力的发展是不间断的、日积月累的，往往是通过日常的、细小的、局部的、无数次的生产活动表现出来。在古代历史上尤其如此。

人们在生产中不仅同自然界发生关系，形成生产力，还必须以一定方式结合起来共同活动和互相交换其活动，否则便不能进行生产。只有在这些社会联系和社会关系的范围内，才会有人们对自然界的关系，才会有生产。这些社会联系与社会关系中最基本的是生产关系，这种在生产力发展的一定水平上形成的作为生产力发展形式的生产关系，具有相对稳定的性质。当它形成之初，它是适合或基本适合生产力的性质的，因而能够促进生产力的发展。当社会 and 生产力继续向前发展时，生产关系的某些环节或形式与生产力的发展不相适应了，往往需要进行若干改变或调整，使之适合发展了的生产力的性质，社会也因此总的量变过程中发生局部的质变。生产力也就有可能在改变调整了的生产关系下继续发展。然而，生产力发展终于会达到这样一个时刻，在原有的生产关系下所作的任何局部的调整都不能适应生产力继续发展的要求，已有的生产关系从生产力发展的形式变成了生产力发展的桎梏，社会革命的时刻就来到了。旧的生产关系被推翻了，代之而起的或是从旧社会母胎中形成的新生产关系，或是崭新的，从未有过的新生产关系，社会历史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生产关系从适合生产力的性质到不适合生产力的性质，从生产力发展的形式到生产力发展的桎梏，然后经过生产关系的变革再次使之适合生产力的性质，这就是生产关系要适合生产力性质的规律的运动过程。在生产关系与生产力这对矛盾中，生产力是最活跃、最革命的决定因素。

因此,认为生产关系与生产力之间的矛盾是社会历史发展的根本动力,或者认为生产力是社会历史发展的根本动力,或者认为生产方式是社会历史发展的根本动力,都是正确的。应当说,这是在不同层次上对历史发展的根本动力的理解。

在关于历史发展动力的讨论中有一些意见,如认为历史发展的根本动力是经济、生产、生产斗争等等,应当说不是错误的,但恐怕不能算是准确的。

有些同志认为还应当从生产力本身的矛盾即人与自然的矛盾的两个方面去探求历史发展的根本动力。他们或者认为自然条件或地理环境是生产力发展从而也是社会发展的最终的决定因素,或者认为人的物质利益、需要或欲望是社会发展的决定因素或根本动力。

这类意见并不可取。因为探讨的是社会的历史的发展的根本动力,离开社会的范围,探讨就失去了意义。“生产在任何时候和任何条件下都是社会的生产”^⑥。不能离开社会、社会关系、生产关系去孤立地考察人与自然的关系;也不能离开社会、离开生产象对待动物的本能那样去考察人的需要、欲望和物质利益。这里有一个范围和度的问题。脱离社会,孤立地分析历史动力问题是不适当的。

生产力的基本要素是劳动者、劳动资料和劳动对象,后者若不是自然形态上的自然物,就是经过劳动加工的自然物。因此自然条件中的一部分是包括在生产力范畴之内的。自然条件中的另一部分则是作为生产的必要的外部条件(如气候)或生产力发展的潜在因素(如未开垦的荒地)而对生产力及其发展起着作用。但是,不能认为自然条件起着决定性的作用,它只有同劳动者的劳动结合起来才能形成生产力。自然条件对生产以外的社会生活也有一些直接的或间接的作用。但是离开人的活动,不与人的活动结合,自然条件并不参与历史的进程。在人与自然的关系上,起主导、决定的作用是人而不是自然。当然,地理环境对历史发展是有影响乃至巨大影响,不承认这一点是不对的。不同的自然条件对社会的发展有着加速或延缓的作用,也使得不同地区的社会历史发展具有各自不同的特色,但它对历史发展的作用不是决定性的。

如果把地理环境的影响夸大为决定性的,还容易导致更为谬误的结论,一些资产阶级学者早就提出过地理环境决定人的生活方式,进而决定人的“文化性格”、国家形态、政治制度以及整个民族的历史命运的理论,在这种情况下带有机械唯物论色彩的地理环境决定论就直接同唯心史观结合在一起了。

那么,作为生产的主体或者历史的主体的人的物质利益、需要或欲望是否历史发展的根本动力呢?

唯物史观重视从阶级之间的物质利益的冲突来考察历史发展的动因,但那是把阶级之间的物质利益冲突看作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矛盾运动的表现来对待的,而前几年历史动力问题讨论中的一些文章提到的“利益”,却不是从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矛盾运动角度立论的,而主要是指人们在物质利益方面的欲望和需要。问题的发生往往就是从这样的偏离开始的。

人们为满足自己的物质利益的需要和欲望而生产。问题是,这种物质利益的需要和欲望又是从何而来。应当说,它们只能是通过生产而产生又通过生产而满足的。生产是物质利益的需要和欲望产生的前提。一定的生产发展水平产生一定的需要。原始人最初是在

生产生活实践中无意识地尝到了烧烤过的动植物的美味,才产生了有意识地烤煮熟食的需要;只有当生产力发展到更高水平时,人们才产生讲究烹调艺术的需要,人们可能产生超越生产力水平的需要或欲望,但只有当那种需要或欲望确是在已有的生产力水平基础上产生的,因而有一定的实现可能时,才能成为促进生产力发展的因素,否则,就只能象上古时代人们关于上天入海之类的幻想一样,至多起到激发人们产生龙宫、月宫之类的想象力的作用,不可能成为促进生产力发展的动力。只有到近代人们在已有的生产力和科学技术水平的基础上产生的探海航天的需要和愿望,才成为促进生产力发展的因素。但这后一种需要和欲望本身已经是生产力发展的结果,而其实现仍然有待生产力的进一步发展。生产产生需要,需要促进生产,但对人类社会而言归根到底是生产的发展决定需要的产生和满足。

不仅如此,在生产各处于不同地位从而社会地位不同的阶级、阶层、集团乃至个人的物质利益、需要和欲望又是各自不同的,而且往往是互相冲突的。这种不同和冲突归根结底又反映了生产关系与生产力之间的矛盾。恩格斯说:“自从阶级对立产生以来,正是人们恶劣的情欲——贪欲和权势欲成了历史发展的杠杆”^①。杠杆的力点,正是生产关系与生产力的矛盾。正如马克思指出:“利益和需要是由一定的物质生产方式产生的”^②。

离开生产力的发展及其与生产关系的矛盾运动去强调物质利益的需要和欲望对历史发展的作用,最终会陷入唯心史观。因为第一,那样就看不到物质利益的需要和欲望产生的真正根源,而势必要把它们的生产根源归之于“人性”或“人类本性”,这就陷入了历史唯心论者主张的“人性决定论”;第二,在那样的情况下,需要和欲望就成了不受生产力的发展及其与生产关系的矛盾运动制约的纯粹主观精神因素了,把这些主观精神因素说成是历史发展的根本动力,就陷入了唯心史观主张的“精神决定论”。

二

在阶级社会里,阶级斗争是历史发展的直接动力。

历史是人的活动。生产关系和生产力的矛盾不是抽象地、自动地发生作用,而是通过人的活动来体现的,即由在生产中处于不同地位的人们的相互关系、矛盾和斗争来体现的。

阶级是生产发展到一定的历史阶段的产物。“所谓阶级,就是这样一些大的集团,这些集团在历史上一定社会生产体系中所处的地位不同,对生产资料的关系(这种关系大部分是在法律上明文规定了的)不同,在社会劳动组织中所起的作用不同,因而领得自己所支配的那份社会财富的方式和多寡也不同。所谓阶级,就是这样一些集团,由于它们在一定社会经济结构中所处的地位不同,其中一个集团能够占有另一个集团的劳动。”^③也就是说,阶级的划分,首先和根本的是经济的划分,阶级关系首先和根本的是经济关系,正是经济上的不同地位和不同的乃至互相冲突的经济利益,形成了阶级之间的矛盾和斗争。

在阶级社会里,每个人都隶属于一定的阶级。在阶级社会里,人们的多方面的活动和关系,诸如政治的、经济的、文化的活动和关系,虽然不能说全都具有阶级的性质,但其本质的活动和关系,或者明显、或者隐晦、或者直接、或者通过多种中介,归根到底是要归结

为阶级的活动和阶级的关系的。生产关系同生产力之间的矛盾对历史发展的根本的动力作用,在阶级社会里,就是通过阶级之间的关系、矛盾和斗争直接体现的。

阶级矛盾和阶级斗争的表现方面和形式是复杂的,多方面的,有经济、政治、思想意识等诸多方面,也有和平的和激烈的形式,而最后的与最激烈的形式则是以推翻国家政权为目标的暴力革命和武装斗争。列宁称之为“充分发展的、全民族的阶级斗争”^⑩,或“真正的、彻底的、发展的阶级斗争”^⑪,但这绝不是意味着暴力和武装是阶级斗争的唯一形式。有些细小的,甚至不引人注目的形式如经济斗争也是阶级斗争,日积月累,它们也对历史起着不可忽视的重要作用。尽管列宁称这类斗争是“萌芽阶级的阶级斗争”,^⑫它不可能起到最后推翻统治阶级的政权的作用,但却也不能忽视和低估。

阶级斗争对历史的推动作用是其具体的历史条件、规模大小、深刻程度而不一样的。

当旧的生产关系已经完全不适合生产力性质,完全成为生产力发展的桎梏时,旧生产关系的代表一腐朽没落的剥削阶级出于自身利益,并不愿意自动退出历史舞台,而他们手中的强大的国家机器就成了维护其反动统治的强大工具,只有依仗代表新生产力和新生产关系的先进的革命的阶级起而斗争,而且往往要采取暴力革命和武装斗争的形式,才能推翻旧政权,建立新政权,给适合生产力性质的新生产关系以应有的统治地位,解放生产力,使之进一步发展。封建制度取代奴隶制度,资本主义制度取代封建制度,社会主义制度取代资本主义制度,就是这样的社会进程。暴力是新社会的产婆,革命是历史的火车头,阶级斗争对历史发展的直接的推动作用,在新旧社会交替之际是十分明显的。

然而,并不是每一次这样的阶级斗争的结果都是先进的、革命的阶级取得胜利。各种各样的因素往往使革命不能一蹴而就,需要经历多次失败、反复。在许多情况下,革命阶级即使胜利,胜利也并不巩固,旧的被推翻的阶级还可能采取暴力的或和平的方式复辟,资本主义制度取代封建制度如此,社会主义制度取代资本主义制度也是如此,往往需要经过很长的时间,新的社会制度,新的阶级才能取得最后的胜利。但是从历史发展总进程看,符合历史发展方向的革命、进步的力量终归是要胜利的。

当某一社会制度还没有走完它的历史路程,也就是说,当生产关系还适合或还没有完全不适合生产力的性质,生产力还能在现有的生产关系的框架内得到发展的时候,阶级斗争也还是存在的。这是因为,阶级社会的基础是一个阶级对另一个阶级的剥削,所以它的整个存在过程都是充满着矛盾的。在生产财富的那些关系中也产生贫困,在发展生产力的那些关系中也产生压迫的力量,没有对抗就没有进步,在阶级社会,生产力就是由于这种阶级对抗的规律而发展起来的。生产力的不断发展的要求总是要促使相对稳定的生产关系作一些调整,只要这种调整是不改变生产关系的基本性质,不改变剥削阶级的统治地位,剥削阶级是可以容忍的、甚至剥削阶级出于本身利益,还可以主动地作一些调整。这种对生产关系的局部,量的乃至部分的质的调整,往往需要经过生产力的代表者—被剥削与被压迫的阶级的斗争才有可能实现。

然而,剥削阶级对生产关系的调整终归是以不致损害其根本利益为前提的,一旦他们感到自己的根本利益受到威胁,就要对被剥削阶级的反抗斗争进行坚决的镇压,这样就使阶级斗争往往发展到再也不可调和的程度,这时,就出现了被剥削阶级的大规模的武装起

义。但是,只要还没有新的生产力、生产关系,没有先进的阶级和政党的领导,这些起义总是失败,即使推翻了旧政权,也不可能推翻旧制度建立新社会。中国历史上的农民起义,就是这种情况。但我们不能因为它限于主客观条件未能成功而否认它也是一种革命运动,更不能诬之为暴乱。因为农民起义究竟是封建地主阶级残酷的剥削与黑暗的统治所引发的,尽管农民自己并不能清楚地意识到自己的历史使命和斗争目标,但起义的矛头客观上却是对着封建制度和地主阶级及其政权的。

大规模的农民起义的失败并不等于它对历史的发展不起任何积极作用。虽然在不同时期,不同的历史条件下它们的历史作用并不一样,这些都需要根据具体的历史条件作具体的分析,而不能用一个简单的模式去硬套。战争必然有破坏,农民战争确实给社会带来破坏甚至很大的破坏,但不论这种破坏有多大,它也只是地主阶级残酷的剥削和压迫的报应,制造报应的工具的,不是农民而是地主阶级本身。而且地主阶级对农民战争的镇压带来的破坏常较农民更甚。所谓“贼来如梳,兵来如篦,官来如剃”,就是这种情况的写照。农民战争对社会生产的破坏,只是一段时期的事,但只有经过这样的战争,在农民付出极大的代价后;原来生产无法继续,社会濒于崩溃的危机才得以消减;阻碍生产发展的腐朽黑暗的地主势力受到打击,社会生产才得以重新进行、恢复和发展,生产关系的若干调整才得以实现或维护下来。从一段长时期看,农民起义对社会生产的继续和发展是有利的,起义中的破坏则是不得已而付出的代价。否定阶级斗争的作用,把暴力和革命在一定时期给生产带来的破坏归之于被压迫阶级的反抗斗争,无视这种斗争是统治阶级剥削、压迫被统治阶级的必然结果,是统治阶级所代表的生产关系阻碍生产力发展的必然结果,看不到被统治阶级的反抗斗争正是生产关系一定要适合生产力性质的规律的一种表现,缓解或消除了生产关系对生产力的束缚,为生产力的继续发展开辟了道路,是不符合历史事实的,是错误的。

把阶级斗争与生产关系和生产力之间的矛盾割裂开来,片面地绝对地强调阶级斗争是历史发展的唯一动力,是错误的。同样,把阶级斗争与生产关系和生产力之间的矛盾割裂开来,忽视、淡化乃至否定阶级社会中阶级斗争对历史发展的直接的动力作用,也是错误的。

三

社会矛盾是多方面的,历史的动力也是多种多样的,社会矛盾是通过人的活动来显现的,而人的活动又都具有各自的不同的意愿和目的。“历史是这样创造的,最终的结果总是从许多单个的意志的相互冲突中产生出来的,而其中每一个意志,又是由于许多特殊的生活条件,才成为它所成为的那样,这样就有无数互相交错的力量,有无数个力的平行四边形,而因此就产生出一个总的结果,即历史事变,这个结果又可以看作一个作为整体的、不自觉地和不自主地起着作用的力量的产物。因为任何一个人的愿望都会受到任何另一个人的妨碍,而最后出现的结果就是谁都没有希望过的事物。所以以往的历史总是象一种自然过程一样地进行,而且实质上也是服从于同一运动规律的。但是,各个人意志——其中的每一个都希望得到他的体质和外部的,终归是经济的情况(或是他个人的,或是一般

社会性的)使他向往的东西——虽然都达不到自己的愿望,而是融合为一个总的平均数,一个总的合力,然而从这一事实中决不应作出结论说,这些意志等于零。相反地,每个意志都对合力有所贡献,因而是包括在这个合力里面的”^②。

不同的个人的意志及其所形成的活动尽管都包括在历史的合力里面,但作用是很不一样的,有大有小。有的起作用,有的几乎等于零,有的顺历史发展方向起作用,有的则逆历史潮流而动,有的又偏离或脱离历史发展的方向。而那最伟大的力量,则是千百万人民群众的力量。“如果要去探究那些隐蔽在——自觉地或不自觉地,而且往往是不自觉的——历史人物的动机背后并且构成历史的真正的最后的动力的动力,那末应当注意的,与其说是个别人物、即使是非常杰出的人物的动机,不如说是使广大群众,使整个整个的民族,以及在每一民族中间又使整个整个阶级行动起来的动力;而且也不是短暂的爆发和转瞬即逝的火光,而是持久的、引起伟大历史变迁的行动。”^③“具有精神品质的是少数人,而决定历史结局的却是广大群众。”^④广大群众、整个阶级的持久的、引起伟大历史变迁的行动方向,也就是终归是经济的情况即生产关系与生产力之间的矛盾的发展方向。在推动历史发展的总的合力中,最终决定着历史发展方向的是经济的力量,而直接表现出来的,则是先进的阶级和人民群众的整体意愿与力量。

人的活动不仅在经济、还有政治、法律、宗教、军事、文化、思想等等。一定的社会上层建筑在一定的社会经济基础上产生,它一旦产生,就具有相对的独立性,并反作用于经济。这种反作用有时很大,甚至在某些情况下可以是决定性的。

比起经济来,这些上层建筑对历史的作用究竟是第二位的。以政治权力与经济的关系来说,“这是两种不相等的力量的交互作用,一方面是经济运动,另一方面是追求尽可能多的独立性并一经产生也就有了自己的运动的新的政治权力。总的说来,经济运动会替自己开辟道路,但是这也必定要经受它自己所造成的并且具有相对独立性的政治运动的反作用。——国家权力对于经济发展的反作用可能有三种:它可能沿着同一方向起作用,在这种情况下就会发展得比较快;它可以沿着相反方向起作用,在这种情况下它在每个大民族中经过一定的时期就都要遭到崩溃;或者它可以沿着另一种方向走,这第三种情况归根到底还是归结为前两种情况中的一种。但是很明显,在第二和第三情况下,政治权力能给经济发展造成巨大的损害,并引起大量的人力和物力的浪费。”^⑤

上层建筑在一定条件下也可以对历史发展起决定性作用。当不推翻反动政权就无法解放生产力时,以革命推翻反动旧政权就成了决定性的。当革命群众没有理论指导就无法正确行动时,“没有革命的理论,就不会有革命的运动”^⑥。然而,这种决定作用不过是经济的最终的决定作用在一定历史条件下的直接表现。旧政权之所以需要由革命来推翻,是因为已经成为生产力发展严重桎梏的生产关系靠着它来维持、不推翻它就无法解放生产力。所以恩格斯说:“如果政治权力在经济上是无能为力的,那末我们又为什么要为无产阶级的政治专政而斗争呢?暴力(即国家权力)也是一种经济力量!”^⑦理论只有与群众结合,才能形成物质的力量,而革命的理论,只有是物质力量的反映,才能与群众结合。哪些因素或人们的活动成为当时历史前进过程中的决定性因素或主要的推动力量,是由生产关系与生产力之间的矛盾的发展在当时产生了什么样的社会需要,从而向当时的人们提出了哪种历史任务所确定的。上层建筑在一定历史条件下的决定作用,正是经济的最终决定作用

在一定历史条件下的具体的直接的表现。

因此,人们的动机、意愿、活动目的对历史发展的作用,历史按照各种动力所形成的合力的方向发展,以及一定历史条件下某些因素或人们的活动对历史的发展可以起决定的作用,同生产关系与生产力之间的矛盾是历史发展的根本动力、阶级斗争是阶级社会历史发展的直接动力没有矛盾,前者包孕了后者,并且是后者的表现形式,后者则是前者的核心,并且是前者最终最后的原动力。

这里涉及到历史发展的必然性与偶然性,规律性与非规律性问题。表面看去,历史充斥着偶然性与非规律性,无数的个人意志与动机,诸多方面因素所形成各色各样的历史活动,互相交错、融合、纠结、冲突、抵消,使得历史的运动光怪陆离,曲折多变,似乎由偶然性和非规律性支配着。它们可以使历史偏离发展方向,加速或延缓历史进程,可以使历史带上特殊色彩,甚至可以使发展在一定时期内逆转。但是,无数的偶然性与非规律性的东西通过无穷无尽的交错中介体现着历史的必然性和规律性,它们是必然性与规律性的补充与表现形式,表面上是偶然性与非规律性在起作用的地方,这种偶然性始终是受内部的隐蔽的规律性支配的。历史的必然性与规律性正是透过各种偶然性和非规律性来为自己开辟道路。经济、阶级社会里的阶级斗争、人民群众在长时期和宽阔领域里通过各种各样的偶然的与非规律的表现体现着它们的历史作用,使历史成为一个“复杂并充满矛盾但毕竟是有规律的统一过程”。

正因为这样,历史事物的发展变化并非只有一条途径,人们在多种途径面前往往需要作出选择,这种出自个人意志的选择,往往会有很大的不同,而导致的结局也大相径庭。然而这种选择却也并非绝对地随意和毫无条件与限制。首先,人们所面临的形势与不同的途径,并不是个人所能决定的,他们只能在社会所提供的选择下作出选择。其次,人们的选择又离不开自己的认识。这种认识,有主观方面的因素,如出身、经历、经验、认识能力、利害关系、性格、气质、品德,价值观念等等,也有客观的条件,如事物的矛盾并未充分展开,或者虽展开却由于当事者的地位处境的限制而不可能认识或充分认识,也有些是在当时条件下根本不可能认识的。因此,这种选择有的正确、有的错误,有的正确又不充分,或者错误尚可挽救,有的则是知其不可而为之。认识了历史发展方向、规律与必然,人们的选择就更其自觉,更其正确有效,然而也不能认为就一定不会犯错误,这只有在实践中才能逐步地解决。

历史的选择,有阶级的、集体的,也有个人的。阶级的,集体的共同选择对历史的影响自然更大,领袖人物的个人作用也不可低估,即使是平时微不足道的个别人,在关键时刻关键地点的个人选择与作用,往往有可能扭转历史的方向。然而,从总体、全局、长时段来看,一如偶然性一样,历史发展并不决定于个别人物,而人民群众的、阶级的抉择、趋向常在很大程度上反映了历史的规律与必然。

因此,需要注意和重视历史发展的多样性、复杂性,重视影响历史发展的各种因素、各种力量及其相互作用,注意人的作用及其意志与抉择,注意偶然性的作用。而不能把经济与阶级斗争的动力作用简单化、单一化、绝对化。另一方面,片面地、绝对地强调历史发展的多样性、多因素性、偶然性、夸大个人的自由意志的作用,或者仅仅强调各种因素相互作用的笼统的“合力论”或“系统论”、忽视或否定历史发展有终级的、决定的因素,也是不正

确的。

注释：

①《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第389页。

②《列宁选集》第2卷，第711页。

③《毛泽东选集》第二版第1卷，第301页。

④⑪⑫《列宁选集》第2卷，第393页，第453—454页，453—454页，第453页。

⑤《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第82页。

⑥斯大林：《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载《列宁主义问题》1964年版，第646页。

⑦《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6卷，第291页。

⑧⑬⑭⑯⑰《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第233页，478—479页，245页，482—483页，486页。

⑱⑲《列宁选集》第4卷，第10页，635页。

（原载《首都师范大学学报》1994年9月校庆增刊）

毛泽东的历史人才观*

邹兆辰

毛泽东在写读史批语和谈论历史时,涉及历史人物最多。他对历史人物,有的给予一般的肯定,有的给予特殊的褒扬,有的则给予贬斥、嘲讽。尽管他对各种人物评价不一,然而他的褒与贬是有他一定标准的。总结起来,大体有八个方面:

一、不以出身取人,着重实际才能

毛泽东曾多次把项羽和刘邦两人同时提出,并通过比较以说明他们成败的原因。他在读《史记·高祖本纪》时,曾写了这样的批语:“项王非政治家。汉王则为一位高明的政治家。”^①在毛泽东看来,刘邦之所以成功,项羽之所以失败,其政治才能最为重要,而这种才能的形成,则与他们的出身有关。在1959年12月至1960年2月读苏联《政治经济学(教科书)》的谈话中,他曾经讲过:“刘邦能够打败项羽,是因为刘邦和贵族出身的项羽不同,比较熟悉社会生活,了解人民心理。”当然,毛泽东并不是把出身看成是决定因素,刘邦之所以成为一位“高明的政治家”,主要是因为他善于用人,善于纳谏。

毛泽东对刘邦善于纳谏这一点感受特别深,他也常以刘邦为例,教育干部采纳不同意见。1962年1月30日,毛泽东在扩大的中央工作会议上,生动地讲述了《史记·酈生陆贾列传》中,刘邦见酈食其的故事,他借这个故事教育干部说:“刘邦是在封建时代被历史家称为‘豁达大度,从谏如流’的英雄人物。刘邦同项羽打了好几年仗,结果刘邦胜了,项羽败了,不是偶然的。”^②

刘邦是小吏出身。年轻时,“不事家人生产作业。及壮,试为吏,为泗水亭长,廷中吏无所不狎侮。好酒及色。”^③他可以说是个“老粗”出身。毛泽东从刘邦的事例中总结出“老粗出人物”的思想。1964年1月7日的一次谈话中,他说:“自古以来,能干的皇帝大多是老粗出身。汉朝的刘邦是封建皇帝里边最厉害的一个。刘敬劝他不要建都洛阳,要建都长安,他立刻就去长安。鸿沟划界,项羽引兵东退,他也想到长安休息,张良说,什么条约不条约,要进攻,他立刻听了张良的话,向东进。韩信要求封假齐王,刘邦说不行,张良踢了他一脚,他立刻改口说,他妈的,要封就封真齐王,何必要假的。……南北朝、宋、齐、梁、陈,五代梁、唐、晋、汉、周,很有几个老粗。文的也有几个好的,如李世民。”^④

* 本文为专著《毛泽东对历史的考察》一书第十二章《毛泽东与历史人物》的第三节。先行发表于此,以求师友改正。

1964年3月24日的一次谈话中,毛泽东再次阐述他的这种观点,他说:可不要看不起老粗。知识分子是比较最没有知识的。历史上当皇帝,有许多是知识分子,是没有出息的。隋炀帝就是一个会做文章、诗词的人。陈后主、李后主,都是能诗能赋的人。宋徽宗既能写诗,又能绘画。一些老粗能办大事情,成吉思汗、刘邦、朱元璋。^⑤

此外,毛泽东对隋文帝杨坚和唐高祖李渊的评价都不高。这主要是由于他们缺乏政治才能,尽管他们是贵族出身,而且又是开国皇帝。毛泽东在《隋书·高祖本纪》上批语是:“蕴藏大乱”,在《旧唐书·高祖本纪》上对李渊的批语是:“遇事无断制。”^⑥

通过对许多历史人物传记的研究,毛泽东似乎得出了一条规律。1964年2月13日,他在春节座谈会上说:历来的状元都没有很出色的。凡是当了进士、翰林,都是不成的,曹雪芹是拔贡出身。明朝搞得好的,只有明太祖、明成祖父子两个,一个不识字,一个识字不多,是比较好的皇帝。以后到了嘉靖,知识分子当政,反而不成事,国家就管不好,书读多了,就作不好皇帝。刘秀是一个大学生,刘邦是个大草包。在这次座谈会上,他还谈到孔子,说孔夫子出身贫农,放过羊,也没有上过什么大学,年轻时是个吹鼓手,人家死了人,他去吹吹打打。做过会计,会弹琴、射箭、驾车子,从小就从群众中来,了解一些群众的疾苦。后来他在鲁国做了大知识分子,大概是有个子路是他的保镖,使群众不敢接近。由此可见,才能的高下,可以说是毛泽东衡量历史人物的首要标准。

二、赞赏勇于建功立业的乱世英雄

青年毛泽东在读《伦理学原理》时,就曾写过这样的批语:“吾人揽(览)史时,恒赞叹战国之时,刘、项相争之时,汉武与匈奴竞争之时,三国竞争之时,事态百变,人才辈出,令人喜读。至若承平之代,则殊厌弃之。”^⑦毛泽东这句话写于1917—1918年,从以后毛泽东一生的读史实践来看,他是始终遵循着这一原则的。即使是在他晚年的读史中,他最赞赏的也是那些乱世中的英雄。

毛泽东对南朝宋明帝刘彧罢黜无道昏君废帝刘子业,以寡对众取得胜利的事迹很感兴趣,曾经写了一大段批语。宋废帝刘子业残暴淫虐,滥杀大臣,为防止他的叔父湘东王刘彧夺权,竟把他当作“猪王”,多次想致他于死地。而刘彧与他的心腹阮佃夫、李道儿等密谋,联合废帝近臣共同杀了废帝。刘彧继帝位,即宋明帝。而他的侄子刘子勋也在浔阳称帝,与在建康的刘彧形成对峙局面。各州郡纷纷响应刘子勋,刘彧十分孤立。刘彧接受蔡兴宗的意见,从政治上瓦解刘子勋,又依靠几位足智多谋、英勇善战的将领,终于改变了局势,获得全胜。毛泽东在读《通鉴纪事本末·废帝之乱》时写道:“刘彧据建康,四方皆反。内线作战,以寡对众,以弱敌强。以蔡兴宗为谋主,以刘休若、刘休祐、刘休仁、吴喜、任农夫、张永、萧道成、王道隆、刘勔、沈攸之、黄回、吕安国、张兴世、刘嗣祖诸人为将帅,终于全胜,可谓奇矣。”^⑧宋明帝继位后,“奢费过度,务为雕侈”,七、八年后,“天下骚然,民不堪命”。^⑨然而,他继位时这场争夺天下的“奇战”,却显示出他是个乱世中的英雄。

五代时后唐庄宗李存勖是靠长期艰苦征战取得帝位的年轻的历史人物。他取得帝位后,由于信任伶人,残酷搜刮等弊政,使他成了短命的皇帝,但他为夺取天下而英勇作战的事迹,仍然是历史上光彩的一页,受到毛泽东的特别注意和赞许。毛泽东对《通鉴纪事本末

·后唐灭梁》一卷也很感兴趣，读得很细并写了几条批语。他十分称赞后唐灭梁中的三个关键人物：李存勖和他的谋士康延孝、郭崇韬。他说：“康延孝之谋，李存勖之断，郭崇韬之助。此三人者，可谓识时务之俊杰。”^⑩在长期争战中，李存勖继承其父李克用的事业，“不栉沐，不解甲，十五余年”。有人建议和后梁“与之约合，以河为境，休兵息民。”李存勖“审机独断”，坚持执行康延孝、郭崇韬的进攻战略，终于获胜。毛泽东批语说：“已成摧枯之势，犹献退兵之谋，世局往往有如此者。此时审机独断，往往成功。”^⑪在准备灭梁的最后战役前，李存勖和其他将士一样，遣送家属准备决一死战。李存勖告别家属说：“事之成败，在此一举。若其不济，当聚吾家于魏宫而焚之。”^⑫对此，毛泽东很是感佩，批了一句：“生子当如李亚子。”^⑬李亚子是李存勖的小名，这句话本是朱温败于李存勖时的感叹之辞，毛泽东引来赞扬李存勖，这是很富于感情色彩的话。

读了后唐灭梁的事迹，毛泽东想起年轻时读过的一首歌颂李克用、李存勖父子的咏史诗《三垂冈》，还能背出诗的全文：“英雄立马起沙陀，奈此朱梁跋扈何。只手难扶唐社稷，连城犹拥晋山河。风云帐下奇儿在，鼓角灯前老泪多。萧瑟三垂冈下路，至今人唱百年歌。”也许是由于有这首诗的印象，所以读起李存勖的事迹，感受也特别突出。

毛泽东对于那些以儒术治国，或者只是守成并无作为的人物似乎不太感兴趣，甚至连西汉的“文景之治”他也并不以为有什么了不起。1957年4月10日他同《人民日报》负责人及有关领导谈话时说：“历史上不是提什么‘文景之治’吗？实际上，文帝、景帝只是守成，是维持会，庸禄无能。从元帝开始，每况愈下。元帝‘牵制文义，优游不断’。他说他父亲宣帝‘持刑太深’，主张起用儒生。宣帝生气地说：‘汉家自有制度，本以霸王道杂之，奈何纯任德教，用周政乎？’并说：‘乱我家者，太子也！’到了哀（帝）平（帝），更是腐败。”^⑭这表明他对“维持会”式的皇帝是不太感兴趣的。他还和人说，《后汉书》只有光武可读，这也是由于汉光武帝刘秀是从征战中承继汉家基业的“中兴皇帝”，所以读起来才有点意思。这也体现了他的人才观点。

三、尊崇硬汉子，鄙弃软骨头

毛泽东对于历史上那些不惧淫威、敢于坚持真理的人，对于大义凛然、以身殉志的人，总是给予十分的尊敬和高度的赞扬，而对于向封建统治者摇尾乞怜，甚至妥协投降的人，则给予鄙规与批判。

毛泽东对汉武帝至宣帝时的将军赵充国很是赞赏。赵充国在汉宣帝招降西羌时提出《不出兵留田便宜十二事》，主张戍边的士兵，平时从事垦荒种田，战时出征。这样可以就地解决军需，为国家节省开支。《汉书》中说：“充国奏每上，辄下公卿议臣。初是充国计者什三，中什五，最后什八。”^⑮毛泽东对此批注：“说服力强之效。”^⑯他还和历史学家周谷城说：赵充国主张在西北边疆屯田，这个人很能坚持真理，坚持正确的主张。他的主张在开始时，赞成的人不过十分之一、二，反对的人达十分之八、九；到后来，他的主张逐渐被人接受了，赞成的人达十之八、九，反对的却只有十之一、二。真理要人接受，总要有个过程，无论是过去和现在都是如此。^⑰

徐有功是唐武则天时期的执法大臣，他坚持执法不循私情，不怕诬陷，甚至不怕丧命。